

现代学术精品精读



西域研究卷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徐文堪
编

现代学术精品精读



西域研究卷 (上)

徐文堪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学术精品精读

西域研究卷

(上)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是为研究生编辑的参考书,目的是让研究生掌握 20 世纪以来本学科的学术史,知道本领域的研究典范何在,保证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基本阅读底线,为研究生教学和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参考资料。

二、本丛书涉及历史、宗教、艺术、文学等人文学科中的一些具体领域,由该领域有造诣的专业学者负责编选和解说。

三、各卷由编者遴选 20 世纪以来该领域中,国内外最具有学术史价值的精品论文约 20 篇(适当包括少量英文、日文论文),并撰写有关本领域的学术史导论和各篇论文导读,提供一定数量的延伸阅读目录。

四、本丛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策划编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确定丛书体例、规划卷别门类、邀请各卷编者及对各卷进行评审,由董少新教授具体负责。

五、本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前 言

20 世纪以降西潮东渐,改变了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学术最大的变化,有人指出,便是自传统科举废除现代学校兴起之后,(一)学术门类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转向文史哲三分天下,(二)学术教育由太学、书院转向大学、研究所,(三)学术传播由口耳相传、书籍流通,转向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四)学术表达由札记、书信、著述的随意率性,转向校园教育的课堂传授,和著作与论文出版的规范纪律化。这些巨变,当然都受到“现代”和“西方”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学者对其产生的意义和弊端,一直在进行自觉和深刻的反思,总是试图“抵抗西方化”和“批判现代性”,另辟蹊径寻找学术新路。

不过,就目前中国状况来说,百年来的学术史,至今仍然在现代的延长线上。如今的大学也罢,研究所也罢,至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仍然需要恪守这些形式、规范和纪律。因此,对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的了解,特别是自己从事的这一学术领域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解,就仍然是有必要的。正如前贤所说,这种“学术史”的了解,一方面是对自己研究的交代,诚实地说明自己借鉴了前人什么样的基础,不至于落入“剽窃”、“偷盗”之嫌疑;另一方面,也可以自豪地说明,自己这一研究,在前人基础之上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就像俗话说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问题只是,你要坦率地承认巨人曾把肩膀慷慨地借给了你。

对于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来说,各自领域中的杰出研究典范,更是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大凡学绘画的人,都经历过写生、临摹到创作的经历,“与古人为徒”更是艺术界“以复古为革新”的惯用途径。其实,

人文学术研究也一样，年轻学者可以从典范论著的揣摩和效仿开始，逐渐走上自己的学术新路。因此，在这一丛书中，我们把各个领域典范式的论著选出来，意在让大家“见贤思齐”。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模拟而不要变新，而是说，希望我们的年轻研究生，得以竖一更高的标帜，既产生“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敬畏和仰慕，也看到“欲穷千里目”必须“更上一层楼”，从而生出与前辈争先的勇气。

现代中国学术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各自从事的领域，家底究竟如何？前景究竟何在？途径究竟怎样开出？这套“现代学术精品精读”丛书，当然完不成这样伟大的任务，但是，通过各编者概说式的“导言”，借助精选的各种典范性“论著”，经由各篇之前引导式的“介绍”，以及后附进阶式的“阅读文献目录”，希望可以让目前正在读的研究生、有志从事学术的爱好者以及对人文学术有兴趣，也喜欢阅读前辈精彩论述的其他读者，对这一百年来蹒跚而行的中国学术各个领域之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14年7月

导 言

“西域”一词，一般认为始于汉代。东汉初班固著《汉书》，立《西域传》，给“西域”定下的地域范围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记主要指今新疆地区。但《西域传》文中所记，却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后历代所说的“西域”，成为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从狭义看，专指葱岭以东；从广义看，则涵盖了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至欧洲和非洲北部。所以，近现代学术界所说的“西域研究”，既包括对我国新疆地区的研究，也往往涉及西北境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西域地处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要冲，西域研究与对“丝路”的研究也密不可分，历来对中外关系和中西交通的探讨都离不开西域研究。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在1877年提出的，以后沿用至今。正如研究“丝路”的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所说^①，尽管这个词富有魅力，但终究具有误导成分。“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一的、清晰的路线，而是连接欧洲与中国的许多不同的陆路的总称。它是由一些若隐若现的路径以及一些并无标记，甚至要穿山越岭，或横跨大片荒地的小径组合而成。在有些地方，这些路径在山口和绿洲交汇，形

^① 韩森撰，王锦萍译：《〈丝路新史〉序》，收入单国铨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成若干重要的城镇。韩森在其所著《丝路新史》中着重论述了丝路沿线有关文物和文书集中出土的七个地点,其中六个地方在中国境内,即尼雅、克孜尔、吐鲁番、于阗、敦煌和长安(西安);另一个是著名的穆格山粟特语文书的出土地点^①,位于撒马尔罕以东约 120 公里、片治肯特(Penjikent)以东约 60 公里,属于塔吉克斯坦。

通过“丝绸之路”输送的并不仅仅是丝绸,而且综观全局,丝绸交易在整个东西方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重要的是,这条东西陆路交通线的历史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是对人类自古具有共同历史的深层认识的可靠的根据。实际上,远在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存在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草原之路”。而草原之路的开辟,是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或内亚(Inner Asia)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按照余太山先生在《欧亚历史文化文库·总序》中的说法,内陆欧亚这一地理概念的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中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东部、印度北部和喜马拉雅地区以及小亚、高加索地区等。在这个极其广阔的地域里,核心地带是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这与国外学者常说的欧亚大陆(Eurasia)或内亚,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就地域而言,是有不少重合之处的。

内陆欧亚地区虽然辽阔,但历来并不被视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往往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实际上,活动于这一地区及其周邻地区,包括中国甘肃、宁夏、青藏高原,以及西至阿拉伯诸国,东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大陆,乃至西欧、非洲的各个族群本身,在历史上都起过

^① A.A.Freiman, V.A.Livshits, M.N.Bogolyubov and O.I.Smirnova, *Sogdiiskie dokumenty s gory Mug*, 3 vols, Moscow, 1962—1963; O.Smirnova, *Ocherki iz istorii Sogda*, Moscow, 1970.

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族群在经济、文化、语言、生态和政治各方面都有广泛的交流和互动。由于内陆欧亚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和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在世界史上也是特别值得研究和关注的。因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进行西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时,应该具有全球史的眼光,不但要努力说明跨区域现象的存在,而且要解释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内东亚的中心位置,通过北方的草原之路和丝绸之路,使我们得以认识古代东西交通的历史。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一片草原地带横跨中央欧亚。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由黑海草原穿越阿尔泰山,一直到蒙古高原,经历了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游牧文化的发展与兴盛。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例如马和马车、射箭技术、冶金术和动物造型的艺术饰品等等,对中国中原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游牧部族的社会组织及军事力量,也在他们向定居和半定居族群,特别是农耕族群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在近百年中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除了陆上丝路外,还存在一条连接海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或称“丝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近代以前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由两大干线组成^①:第一条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第二条是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领域。

除以上三条对外通道,还存在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史记》所记张骞西域之行已经记录了由中国西南到印度的道路。张骞在大夏(Bactria)发现了来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说明可以从四川经过云南、缅甸、阿萨姆到达印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提供了许多有关南方丝路的物证。

^① 龚缨晏主编:《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不久之前，杨斌博士出版了专著^①，充分利用中文史料和非中文材料，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南方丝路全景。在这条丝路上，云南起了枢纽作用，而且与北方的草原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互间有紧密的联系，在时空上互相融合和补充，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系统化的网络。例如，云南曾出土过许多青铜时代的遗物，其中的“动物纹”牌饰明显渊源于北方草原地区^②。日本民族学家白鸟芳郎的研究^③是很有启发性的。

现今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已经证明：石器、陶器、粟、猪、土坑葬、玉器等定居农业文化因素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的外来因素，但在东亚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至万年前，因此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其他如青铜、小麦、黄牛、绵羊、马与马车及骑乘、火葬、金器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在东亚不早于五千年至四千年前，因此青铜时代存在大量外来因素^④。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等人创建了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研究社会及社会变迁的方法，除了继承新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法国年鉴学派对其也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深受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长时段”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出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的时段中，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于其中的基本社会、经济、文化结

① Bin Yang,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第9期，第808—820页。

③ 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朱桂昌译），载《世界民族译丛》第1辑，云南民族研究所1982年编印。

④ Kathryn M. Linduff (林嘉琳) ed.,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273页。

构。虽然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关心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结构的历史发展,但有的学者如 Andre Gunder Frank 和 Barry K. Gills 等坚持认为地球上存在着一个已经持续了五千年的世界体系^①。对西域和云南等地区古代文明的研究,正好扩展了人类历史的研究视野,并为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西域地区是全球范围内对外联系最为多元的地方,因此西域研究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课题,而应是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课题。要全面认识像西域这样的地区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进程,缺乏全球性的视角是不能作出合理而公正的解释的^②。

对西域地区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远的历史,也取得了许多切实有用的成果。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并且至今还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正如塞诺(Denis Sinor, 1916—2011)教授所指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史料缺乏。我们能够利用的,除了汉文资料外,还有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和俗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形形色色的语言资料,但这些材料都是第二手的,而且往往语焉不详、互相矛盾。仅仅研究阿兰人(Alans)的历史,其基本资料就涉及了十五种语言!即使你掌握了所有这些资料使用的语言,又如何融会贯通地予以运用,从而揭示出这些材料内隐藏的真相呢?西域各民族自己写作的史料严重匮乏,而且往往时代较晚。例如我们拥有的吐火罗语资料,主要是唐代前后的,绝大多数是佛典,也有一些世俗文书,但说这种语言的人群的历史至少要比这些文书早一千年甚至二千年,我们又凭什么来追溯他们的起源和历史呢?

第二个难题,数十年来西域地区通过考古发掘也积累了为数甚多的考古学材料,时代从十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直到近代,近年

①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3—58.

② 对这一观点不拟作深入阐释,请参看杨斌:《马、海贝与白银:全球视角下的云南》,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360页。

来,各国的考古队的合作和许多国际会议的召开,更推进了这个领域的国际化,但还是如塞诺所指出:考古学的结果很难直接转变为历史的命题。例如,早在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1952)、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就来到宁夏水洞沟考察,在一处断崖边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又发掘出石器制品和动物化石,证实水洞沟在三万年前就有人居住。九十年来,水洞沟遗址经多次发掘,包含12个旧石器地点,共出土三万多件石器和大量古动物化石。尤其是出土的石叶工具,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接近。从目前的资料看,水洞沟工业与境内最可比的资料是1995年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附近沟西台地区的石制品组合,在那里采集到相当数量的石叶和产生石叶的、修理台面的石核及用石叶做的端刮器和尖刃器等。沟西台的石制品是否可能是水洞沟工业技术的部分源头呢?它们与境外如贝加尔湖地区、叶尼塞河流域阶地黄土中的石制品又存在什么关系呢?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历史时期东西方交流中,“丝绸之路”的前身是史前时期的“石器之路”(Lithic Road)。距今数万年前,是否确曾存在这样一条“石器之路”,由于证据尚不充分,目前似乎只能存疑。但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年代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时代与亚洲现代智人的出现紧密相关。对此,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不断加强我国西北地区和境外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交流。

第三个难题,近二十年分子人类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进展使这两门学科与考古学、历史学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应该怎样运用和整合这些学科的成果,加深我们对西域历史文明的认识?例如:根据最近的报道,新疆尼勒克县在2013年发现的7座墓葬和3座遗址,均属于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遗存范畴。安德罗诺沃文化大致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起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中国新疆,南至土库曼斯坦,北达北方森林地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联合体,其内部因地域而包含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根据

梅建军先生等研究^①,可以认为这种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后已经从西北方向进入新疆,其影响所及已至新疆中部和南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展,是与说印度—伊朗语的骑马游牧族群的兴起过程有直接联系的。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初期的斯基泰—塞人时期,与骑马民族有关的生活方式,曾经影响了塔里木盆地东南边缘地区,并进而影响到青藏高原北部、川西高原,甚至远至滇西地区。至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一些说东伊朗语的塞人部族就在和田绿洲定居下来,建立了于阗王国,并且留下了大量用于阗塞语书写的文献。关于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传播与于阗塞语形成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还缺乏研究。又如新疆小河墓地干尸多见亚麻色头发和睫毛,这是高加索人类型的外貌特征。但出土人骨的Y染色体分析揭示出只有印欧人中常见的单倍群R1a1a,而线粒体分析表明既有东部欧亚谱系的单倍群C,又有西部欧亚谱系的单倍群H和K,说明至少在4 000年前,东西方人群就已经到达新疆,其基因混合的发生地点可能原在西伯利亚,后南迁至塔里木盆地^②。小河晚期人群的遗传结构更为复杂,既有西部欧亚成分,同时南亚成分和东亚成分增多,表明小河人群在迁入塔里木盆地后,一直不断地与周边人群发生基因交流,以至于逐渐改变了人群原来的遗传构成。新疆古代至少存在说两支不同印欧语—吐火罗语和印度伊朗语的人群,这种语言状况是否也能与人群的遗传学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似乎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总之,中外学者对西域地区的研究,虽然历经一个半世纪以上,新的成果也正不断涌现,但还存在大量未解之谜。下面将对西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概略介绍。

之前已经谈及,狭义西域主要指中国新疆,但近代以来,新疆

① Mei Jianjun and Colin Shell, 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Antiquity* 73, 1999, pp.570—578.

② 李文瑛:《科技考古在小河文化研究中的应用》,《中国文物报》2013年11月8日。

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或自治区；而我们所说的西域，已经超越了新疆的范围，因此在下文讨论西域研究史时，主要涉及对古代西域的研究，对近现代西域的研究一般从略。

中国在清代道咸年间以后，对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十分兴盛，这也是鸦片战争后学术风气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元史和蒙古史的研究相互推动^①。这与因外国势力侵入西北而使忧患意识增强及对外国史地知识的渴求结合在一起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祁韵士(1751—1815)、张穆(1805—1849)、徐松(1781—1848)、何秋涛(1824—1862)、陶保廉(1862—1938)等人为代表的清代边疆史地学的成就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除了以上这些个人的研究外，清朝官府也组织了一批学者，编纂了一些地理志书，如《皇舆西域图志》(52 卷，1756—1782 年)、《新疆图志》(1900—1911 年)，都是既参考历史文献，又经过实地考察的大型地方通志，为新疆地区史和中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同时期的欧洲，对西域的研究也正在逐渐兴起。德经(De-guignes)在 1756—1758 年刊行的四卷本《北方诸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avant et depuis Jésus-Christ, jusqu'à présent*, I—IV, Paris)，是一部巨著，名重一时。以后雷慕沙(J.P.A. Rémusat, 1788—1832)著有《于阗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等，整理有关于阗的汉文史料；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Paris, 1836)。其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彦棕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 1853)。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比丘林(Nikolai Iakovlevich Bichurin, 1777—1853)在 1851 年出版了《古代

^① 侯德仁：《百年来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西域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27—134 页。

生活在中亚各族的资料汇编》(*Sobranie svedenij o narodah, obita-vshih v Srednej Azii v drevnie vremena*. In 3 parts. Sankt-Peterburg)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50年曾重印出版,至今还经常被引用。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李希霍芬从1868年起对中国进行了近四年的地质地理考察。回国后,他发表了多卷并附有地图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1877—1912年)。在书中,他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的名称来说明从中国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法国汉学家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对西域史研究有重要贡献。他译出了一些重要的汉文西域史资料,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纪》,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书为世所重,至今仍是研究古突厥史必须参考的要籍。

对丝绸之路沿线进行“探险”考察的最兴盛的年代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通过这些活动,各国考察队都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写本和各类文物。考察者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匈牙利出生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 Aurel Stein, 1862—1943),德国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俄国的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 1863—1934)、柯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日本的大谷光瑞(Ôtani Kōzui, 1876—1948)也组织和资助了三次在中国西部的探索^①。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大量艺术品,揭示了西域各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各地墓葬、石窟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的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西方和日本学界,许多有成就的学

^① 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J. Murray, 1980.

者都投身于对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各种语言写本的考释研究中去，其中早期的著名学者有研究汉文写本的沙畹、马伯乐(H. Marpero, 1883—1945)，研究梵语等古印度写本的吕德斯(H. Lüders, 1869—1943)、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研究吐火罗语的西格(Emil Sieg, 1866—1951)、烈维(S. Lévi, 1869—1935)，研究古代突厥语文书的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研究于阗语的科诺(S. Konow, 1867—1948)、贝利(H. W. Bailey, 1899—1996)，研究中古伊朗语的大家亨宁(W. B. Henning, 1908—1967)，研究古藏文文献的陶慕士(F. W. Thomas, 1867—1956)等。日本的西域研究自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始，在语言学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首推羽田亨(1882—1955)。伯希和的语言知识非常丰富，他不仅精通汉语和日语，其著作还涉及藏语、波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吐火罗语、越南语、高棉语等多种语言。

1909年，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陆续编纂了《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遗书》等，并刊布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等。这一时期，国内从事西域遗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则是王国维(1877—1927)。他曾通过日文翻译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1919)^①，在谈到新疆出土的古代印欧语材料时，特加按语说：“印度欧罗巴语系亦谓之阿利安语系，即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峨特语等之总名，皆自同一母语出，其语昔分十种，皆谓此外更无属此系之言语。至新疆古文字出，乃知其不然。”说明他对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性质和状况，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认识 and 了解，着实难能可贵。王国维和罗振玉在收到沙畹

^① 《观堂译稿上》，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4页下。

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对这些出土于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的汉晋简牍进行考释,并辑成《流沙坠简》(1914年;增订本,1934年)。王氏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另一位开西域研究风气之先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他对中国古籍有深厚功力,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遍学与西域研究有关的东方语言。回国后,对中国的西域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先生在这方面的论文多数已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等文集中,其他已刊未刊论著亦编集为《陈寅恪集》,成为宝贵的学术遗产。

此外,陈垣(1880—1971)对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外来宗教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张星烺(1888—1951)分类汇编中外史籍中有关中西交通的材料,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1930年)。吕澂(1896—1989)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佛学家之一,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语言,长于佛教文献比对和义理探讨,其研究涵盖印度、汉传和藏传三系佛学,而且以批判精神追溯佛法源流,学术成就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及日本的第一流学者毫不逊色。他的主要论著如《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皆堪称经典之作。冯承钧(1887—1946)在翻译外国学者特别是法国学者关于西域研究的论著方面有重要贡献,除《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行纪》《蒙古与教廷》《帖木儿帝国》等专书外,其主要译作已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氏本人也留下了《成吉思汗传》《西域地名》《景教碑考》等著作和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已由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刊,1933年)系统探讨了中亚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并且大量运用了新出史料,实为以后敦煌学研究的先声。黄文弼(1893—1966)是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方成员,